

SHANGGU HANYU TONGYUANCHI YIYI XITONG YANJIU

上古汉语 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

黄易青 著



商務印書館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 系统研究

黄 易 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2007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黄易青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7-100-05294-7

I. 上… II. 黄… III. 汉语-同源词-研究-上古 IV.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23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资助出版**

SHANGGU HANYŮ TONGYUÁNCÍ YÌYÌ XÌTÖNG YÁNJIŪ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
黄易青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瑞 古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5294-7/H·1270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定价: 36.00 元

序 一

我遵易青先生之命,为《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作序。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用十多天时间读完了这部大著。理论著作,尤其是原材料十分丰富且具有独创意义的理论著作,要一口气读完,很不容易,阅读过程中免不了还要查检一些相关资料,这就更费时费事了。但这种“费时费事”是值得的,也是我所乐意的。我从来都认为:阅读别人的著作,并不是要自己去当裁判,而是在保持独立思考的前提下,互相交流、沟通、理解,以求共同进步。多年的阅读经验,也使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把读书与“读人”联系起来。读《论语》就是在读孔子,读《史记》就是在读司马迁,读《观堂集林》就是在读王国维,读《管锥编》就是在读钱钟书。什么样的人能写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一定得由什么样的人来写。这部《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不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黄易青吗?优点是黄易青的,缺点也是黄易青的。个性鲜明,品格突出,书如其人,人如其书。按照这个思路去读这本书,我们就能在理解这部书的同时也理解它的作者黄易青。学术著作能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极为宝贵的。人云亦云的所谓“著作”是不值得“费时费事”去读的。

我认识黄易青先生已有十个年头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6月19日,他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印象之一是,

此公相当执著,这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印象之二是,此公长于和善于思考,在理论上有独特的追求。

第一印象是不会错的。当然,论人论学不能只凭一时印象,而这本《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完全可以证明,我的印象是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

在 97 年 6 月那次答辩会上,易青的论文不仅顺利通过,且获得好评。从那时到现在,易青又用了整整十个年头进行增改,完成了这部大作,为汉语同源词的理论探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十年磨一剑,这就是执著,这就是独特追求。“执著”加“独特追求”等于精品。左思赋《三都》,“构思十年”;曹公“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王念孙疏证《广雅》,“十年而成书”;王筠著《句读》,“时阅十年,稿凡三易”;马建忠“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而成《文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论著不在多,有精品则成。精品,学术精品,不可能一蹴而就。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才有成功的可能,但还不是必然。因为真正的精品,“实学人词人不可少之书,而古人今人未始有之书,所谓似因而实创者”(谢增《说文通训定声·跋》)。“创”,不仅需要时间,需要勤奋,更需要眼光、洞察力。哪种书是“不可少之书”,哪种书是“未始有之书”,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回答正确了,著者的独特追求肯定就能符合该学科发展的方向,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执著精神,创精品的条件就完全具备了。

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同源词的研究也不例外。王力以前的汉语同源词研究,成果已相当可观,王力的《同源字典》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具有里程碑的性质。黄易青怎么办?如果重复章太炎、王力的路子,也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却不能说是“不可少之

书”、“未始有之书”。所以,黄易青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前人留给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由谁来解答?能提出问题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能解答问题的人。黄易青的答案是:

归结起来,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词源意义,进而是意义变化发展规律即运动规律,最后是同源意义系统。

词源意义和意义运动规律,都是同源意义系统研究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全书洋洋数十万言,就是对这三大问题进行研究探讨。黄易青所探出来的各种观点、结论,未必人人信服,但有一点我想是不会有争议的:黄易青这部论著的问世,标志着汉语同源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探讨阶段。黄易青在全书“结论”中说:

我们认为,同源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系,而是能够探讨、了解整个意义系统的面貌和结构组织方式,以及词义运动规律和这种规律所反映的古人认识规律、古人所理解的事物发展规律。上述的这些,都是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

“执著”的人,有时容易“执一”而忘二。“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是重要的,但绝对不能说“证明哪些词之间有无同源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章太炎、王力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最重要”,到了黄易青所处时代有这个时代的“最重要”。不仅不能以此“最重要”来否定或贬低那个“最重要”,而且没有那个“最重要”就不能有你今天这个“最重要”,所谓“学术发展有自己内在的理路”,道理就在于此。同时,我们还要区分:“重要”与“正确”是两回事。“重要”指课题本身的价值,“正确”

是指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我们肯定“本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既是正确的,又是重要的,因为黄易青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具有时代意义,在汉语同源词的研究史上具有“似因而实创”的特点,所以是重要的;他通过持久的研究,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一课题,从学术价值而言是正确的。

现在的学术界,有不少人把理论探索、把“似因而实创”看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动辄宣布自己填补了什么空白,宣称自己独创了什么什么新理论。其实,也可能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是盲人摸象,也可能是坐井观天。黄易青先生不是这样的人,他懂得个中的艰辛。他用十年时间,呕心沥血,研究了“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的不同”,在理论上,这是一个重要突破。他还研究了词源意义的实质,词源意义的变化发展与意义系统的结构,上古汉语同源词的意义通关系等等,从术语到体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字里行间没有丝毫的自鸣得意。书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一段鞭辟入里的警言:

科学的词源研究有它巨大的困难……

词源学难,难于上青天!

这是一个十分繁重艰难的工作。

正因“困难”、“艰难”、“难于上青天”,才要求研究者应具有献身精神,具有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古之儒家有所谓“士志于道”,有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孔门提倡的以身殉道。释家提倡的是舍身求法,七世纪的三藏法师就是典型。他 26 岁西行求法,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成为当时国际上顶尖级的学术大师。我们不妨读一读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书中记载的曲女城法会,至今读来还令人惊心动魄,作为论主的三藏法师敢于将自己的论意“写一本

悬会场门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到会诸王、诸僧、小乘外道等等,“充塞数十里间”,“无一人致言”,“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玄奘获得了世界性美誉。“诸众欢喜,为法师竞立美名”。我觉得那些热衷于搞窝里斗的先生,应该像玄奘那样,到国际论坛上斗法。“兄弟阋于墙”,“相煎何太急”!

任何人从事任何一种理论探索,都会留下种种不足之处。同源词研究,说到底还是音义结合问题。说义不能离开音,说音不能离开义。尽管侧重点可以不同,但在选取具体例证时音义必须契合。本书也提供了一个上古音体系,大体上只是类的划分,音值的描写缺乏系统性。因此书中虽然有大量义同、义通的材料,而读者无法获得明确的语音根据。语音根据不十分明确,“同”、“通”的论据就不能算是充分而坚确。

黄侃先生说:“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他那篇《音略》,几乎是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从语言简洁而言,实为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习。此书语言还欠简洁,宜仔细斟酌。

多年来,我常应年轻朋友之命为他们的大著作序,有时借题发挥,针贬学弊,逆耳之言,取憎于人。余岂好为人序?又何敢招惹是非?为了迎接新的学术高潮,促进学术发展,必须纠正不良学风,这是学术界的共同愿望,非余一人之私见也。

何九盈

2006年9月7日于西郊蓝旗营

序 二

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即将出版,这部书稿的初步完成,比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一书的初稿早一年。在孟书先于它出版后,我们盼望黄易青这本书出版,已经很久了;因为,只有分别从音和义两个方面来观察汉语同源词,才能对汉语词源有较全面的了解。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汉语词源从汉代开始,有将近 2000 年的历史,大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训诂形式表现的词源探讨,它的主要方式是声训。《释名》的全部和《尔雅》《说文》《方言》的一部分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综合实践和理论证实的高峰。第二阶段是词源原理的初步探讨阶段,它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对音义关系的推测,另一个是对汉字孳乳与汉语词派生关系的辨正。从“右文说”到“右音说”,标志着这种探讨日益接近了真实的理念。第三阶段是在自觉理论上词源的全面系联,章太炎的《文始》特别是其中的《文始叙例》,标志着传统词源研究已经向现代词源学迈进。到了现代,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有了更多的现代意识。两千年丰富实践和理论探讨的丰厚遗产,等待着我们去整理、解读、开掘和总结,不幸的是,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一串耸人听闻的罪状,把这项意义重大的继承工作整整推迟了 40 年。汉语词源学是训诂学的尖端课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这不只因为数

十年的“大批判”已经使被发掘出的汉语词源理论蒙上了一层薄雾,成见蒙蔽了一些人的眼睛;还因为汉语词源所显示的诸多现象具有很明显的特性,的确是西方语源探讨不曾涉及到的。比如,上古汉语单音词的分化与形声造字的天然联系,带来了汉字谐声偏旁具有的示源功能,习惯把汉字与汉语绝对分开的人,习惯用西方历史比较方法思考问题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再如,声训同样具有解释典籍的作用,这种解释与义训不同,它的解释性能蕴藏在训释词与被训释词相近的声音所承负的词源意义里,这是西方解释学完全生疏的命题。又如,汉语单音词的构词理据不但会在暗中影响它引申出新义,还会影响它与其他词的结合功能,这是自称具有“普遍性”的西方语言学没有验证过的……所有这些,需要用大量的事实去证明,还需要为之设置可以反映现象本质的词源学术语,更需要一种有力的理论阐释来说服视“音近义通”为“唯心主义”的人。科学在未被解释清楚时会使人感到神秘,除去这种神秘需要有一种信念,一种被事实感召、对古人倾服的信念。信念带来的是一种执著的追求——受到批判不回头,面对压力不放弃;信念同时还应当带来一种追求真理的谦虚——为了探求去思考他人的反面意见,为了探求去忍受嘲笑和否定,永远把纠正自己与证实自己当作同等的欢乐。那是一种苦与甘交替的境界,冷与热互动的境界,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读《释名》的时候,在陆宗达先生指导下作《文始疏证》的时候,我是经历了这种心中火烧火燎而四周却寂静冷漠的时日的;因此,我很理解和珍惜黄易青将汉语词源研究科学化不懈追求。

孔夫子在《论语·为政》里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庸》说“博学”“慎思”,说的都是在求学时学与思不可偏废。我

觉得,黄易青就是在学思的漫长岁月里,磋磨着有两千年研究传统的汉语词源学。易青关注汉语词源问题从他攻读硕士学位开始,那时候,他对汉语词源有过很多特别的想法,是我们很难接受的。他和我们辩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话不投机”,有时彼此都很冲动。他调换过两次工作,但对研究词源的热情有增无减,硕士毕业后,他继续从曹述敬先生学习音韵,对词源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攻读学位之前,他已经开始准备汉语词源学方面的材料,整理自己多年的积累。我建议他认真阅读汉语词源学的开创之作《文始》,他系统作了《文始》孳乳与变易字的系联。其实,《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关系研究》这个题目,在他博士入学前几年就已经定下了。他是在《中国教育报》繁重的编辑工作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他跟我讨论次数最多的当然也是汉语词源原理,那不过是此前长期工作的一种延续罢了。他的博士论文于1997年完成,至今又是整整9年了,他一直在修改书稿。黄易青是一位求真求实又有个性的研究者,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一旦领悟,却能立即放弃己见。我们的讨论既有欣然达到共识的时候,也有各自保留所想的时候;在他修改的每一篇文章和书稿里,我都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否定和纠正,同时也看到了他对自己已经确认了的想法的坚持。我并不赞同他所有的观点,但很尊重他学与思之所得。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这篇论文是我们清理传统词源学系列论文的第一篇。音与义是词源问题不可分割的两面,我们为什么率先选择“义通”作为汉语词源研究的入口?因为从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开始,把握同源词的语音问题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规则,要进一步清理语音关系的细则,不能不涉及意义,而在当

前汉语的同源词系联和理论研究中,对词源意义的把握最为混乱。那时,关于词源意义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有些人不认为汉语早期单音词的词源意义可以进行科学规律的探讨,最多是把理据的推论对象限制在现代双音词上;因此,在系联上古同源词时,虽然“音近义通”的原则难以否定,但在实际操作时只注意“音近”,不着重讨论“义通”,把两个维度的条件变为单一的条件;由于不重视对意义关系的探讨,音与义彼此没有参照,从而忽略了少数音远现象,使系联中断,致使一部分同源现象被掩盖。第二,或许是由于把构词理据与词汇意义都称做“意义”的缘故,很多论著常常把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混淆在一起。比如,有些文章常常直接用义训材料来论证同源关系;又比如,有些文章会把义项偶然重合的同音词和偶然音近的同义词当成具有渊源关系的同源词,无形之中把同源系联扩大化。现代学者所说的“内部形式”,其实说的就是构词理据,但由于界定不严,在有些文章里,一会儿指“命名根据”,一会儿指“义”,很难与汉语同源词的事实对上号。第三,是对上古汉语同源词与汉字的关系有不恰当的理解和处理:有人至今全盘否定“右文”现象,也有人滥用“右文”讲解字义,又用字义代替词义,甚至混淆了形声字与会意字的界限。这些问题都需要用专门的课题来解决。

《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这个题目,是想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对“义通”问题做一个细致的梳理,试图全面探讨“音近义通”的规律,弄清汉语同源词的相关原理。虽然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易事,更不可能由一人一文来彻底完成,但必须提到日程上来,才能逐步接近事实,完善理论。做这件事的关键首先是继承,要对前人早已注意到的问题加以辨析,对汉代以来的传统必须充

分重视,而这往往是受过大批判洗礼的现代人容易忽略的。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有着明确的继承和发展的观念,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起步的。他原稿在“同源词研究的历史沿革”一节(书稿为绪论第一部分)中,对汉代以来有关同源词研究的学人和成果做了准确的介绍和梳理,有肯定,也有对他们局限的批评,例如,对“右文说”恰如其分的肯定,对《文始》恰如其分的批评,都很切中要害。而且,这本书的继承观念不是只局限在专门说明沿革的这一节里,而是贯穿全书。他不是盲目地模仿前人,因袭旧说,而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前人的成果,在今人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补充,有所发展。在这本书里,随处可以看到作者的继承观念和理论思考:书中采用了我们提出的意义结构两分法。这种方法,借鉴了西方的“义素”概念来说明词源意义的存在,解释词源意义或隐或现的事实,但不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的义素分析法进行多层次的特征提取,而是注入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经验,区别了词义内部结构中“义素”的不同性质,对古人一贯的做法给予了必要的理论阐释,使其明确而具有可操作性。书中对陆宗达先生和我提出的比较互证法有较好的发挥和发展,不仅把比较互证当作对同源关系验证的方法,更把它作为同源系联的一种有效的运作方法。书中对词源意义和词汇意义究竟区别在什么地方作出了初步的论断。把感觉范畴的词源意义分为视觉范畴和听、触、味、嗅范畴两大部分,并提出一个心智范畴来与上述五个感觉范畴相对。在视觉范畴内部,他分成形态、质量、量变和组构,说明意义发生关系的四种类型,同时提出了“意象”的概念来说明视觉范畴中词源意义的内涵和实质。他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词源意义关系中的各范畴、各层次的相通关系和对立统一关系。这些认识和做

法,既明确了词汇在原生阶段和分化孳乳阶段的发展依赖的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感性认识,也明确了这些发展的过程与结果,是暗合了事物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规律的哲理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学与思不偏废的工作态度和创新精神。

黄易青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他首先面对的是一大批同源词系联的第一手材料,他善于把对同源材料的甄别与同源理论的建树结合起来进入操作层面。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功底帮了他的忙,他是在对 8000 多个先秦汉语单音词进行同源系联的基础上,将同源词意义关系的诸多现象提升为原理的。在系联这批同源词时,为了避免音与义探讨的循环论证,他对语音的把握非常严格,以便排除例外,专一进行“义通”的探讨和归纳。应当说,上述那些规律的总结,是在对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归纳的基础上得出的。

汉语词源的研究面对的是语言中潜在的要素,表层的描写中难以看到词源对语言的作用;但是,任何潜在的存在都会在外部有所表现,只是其中种种用一般的描写方法难以发掘和概括罢了。汉语词源研究的难度决定了它研究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所以,黄易青在本书里所谈到的问题不会都是定论,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地方。例如,人们习惯于用“音近义通”来概括汉语词汇同源的基本条件,“义通”的“义”采用与词汇学的“义”同样的术语,这足以使初学者产生误解,也容易在与西方语言学对话时与词汇意义混淆。这个问题黄易青在书中已经提出了,但还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解决。再如,构词理据是否都是人类感性认识的成果,怎样解释其中理性的成分。又如,词源与汉字的关系中,也还有一些现象得不到解释,这说明有些内在的规律还没有发掘出来……深想起来,汉语词源学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不少问题至今我们没有触及或没有深

入到本质上。我相信,根据黄易青的性格和治学态度,他不会把这本书当成一个终点,他会有更浓厚的兴趣,再次积累,再次投入,从新的起点上步入新的跑道。

王 宁

2006年3月

北师大

例 言

一、本书以《尔雅》《方言》《说文》《广雅》所收字词及其训诂为语料,大量引用此四书的训诂及其清人注疏和汉语经典文献语料为论证材料,为避免文繁,并考虑到这些都是本专业常用工具书、专书或文献,其编排体例为专业读者所熟习,故其引文一般不出注,仅在正文中注明篇卷。大徐本《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简称“段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简称《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简称《疏证》,钱绎《方言笺疏》简称《笺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简称《通训定声》,桂馥《说文义证》简称《义证》,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简称“徐笺”,所据版本见书后参考书目。

《尔雅》各篇,略书名,只称篇名,如《释诂上》《释诂下》《释言》等。《广雅》各篇,为避免与《尔雅》混,不略书名,如《广雅·释训》;惟其《释诂》标出卷数,略书名,如《释诂》一……《释诂》四。

此外其他书之称引,遵用一般称法。

二、论证行文用简体字;例证中如果不至产生混淆或影响谐声关系的表现,则尽量用简体。如“鏘”与“蹒”同声,“鏘”不必作“鏘”,“将”声亦不必作“將”声。有几种情况用繁体:(一)上述专书和其他古籍引文,所讨论涉及的字词必须用繁体才能体现古音或谐声关系及同源字关系的字。如“黔与陰通”,“陰”不作“阴”。但如果简体并不简化声符字形或不影响谐声关系识别的,则仍用简

体,如“軫”不必作“軫”。音义关系的讨论并不涉及的字,虽为引文亦不用繁体。(二)讨论中用繁体才能更好体现与词源意义有关的造意或本来的形声关系的字。(三)在方正超大字符集才能找到的字。与之同声符而有简体的,在一起讨论时也作繁体以显示同声符关系。(四)繁体有分别而简体合为一形,在讨论中如果用简体就无法分辨的字。如“向同嚮”,“嚮”不作“向”。上述情况必要时采取加括号互注繁简的方式。所用的繁体,只限于所讨论字词有必要用繁体的段落。由此在全书甚至上下文中会出现繁简用字不尽一致的地方,或标准较难掌握的地方,请读者谅之。